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96 期

2019 年 1 月 31 日

目 录

【论 文】

如何认识各民族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戢广南

形似而神异：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民族识别与美国种族识别 励 轩

港澳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研究——基于 A 大学的问卷调查 梁茂春

【网站专访】凝心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访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勇

【书 讯】《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马戎）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如何认识各民族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¹

戢广南²

摘要：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存在思想障碍。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确立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要破除思想障碍，充分认识各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汉语”不仅是汉族的语言，而且是中国各族人民通用的共同语言。学习掌握汉语，是中国各族人民学习现代化知识最便利的方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的交融、民族共同性增加是文化和民族发展普遍规律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认同；民族；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这是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国家统一、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也是推动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的惠民之举，具有深远意义。

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存在的思想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培养和树立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对我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边疆民族地区，影响国家认同、制约各民族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新疆南疆群众）中普及度低的问题。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和形势的迫切要求，是历史的必然，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边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举措，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群众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思想困惑需要解决。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三股势力”出于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攻击“新疆式双语教育”政策“侵犯人权”“同（汉）化”维吾尔族，一些群众容易受到蛊惑；二是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感情，担心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会导致少数民族文化消亡；三是一些人在民族语言问题上还存在认识误区，片面地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看作只是汉族人的语言，似乎强调“汉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就是违背“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法律原则。

多年来，这些认识影响甚至误导了一些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了，但边疆民族地区相当多人口（特别是新疆南疆）仍然长期不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严重制约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发展进步。多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认识模糊、方向不明，实践中左右摇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不从深层次解决，势必妨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

问题的焦点在于到底怎样看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怎样看待汉语的性质和功能？怎样看待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这需要各民族干部群众正确认识语言文化发展历史规律，自觉站在维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9 年第 12 期。

² 作者工作单位：新疆文史研究馆。

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破除思想障碍，澄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只是汉族语言，普及汉语不符合各民族语言平等政策”等模糊、错误认识，提高对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法律地位的认识，坚定坚决、依法依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实践迫切需要对语言文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确立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语言统一是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构建国家的基本要素，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基本载体和象征，是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治国安邦的重器。民国时期报刊通过语言大讨论得出共识，“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如果人们“各操土音”，必然“对面无言”“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而如果“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因而，“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选择一种社会功能广泛的语言作为通用语言，是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是各族人民共同建构“国族”和现代国家的历史必然。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全国主体人口的沟通交流工具，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和中国特色文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财富，也是中国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是树立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汉语是中国的法定通用语言，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表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国家标准语言、官方正式语言，地位高于各地汉语方言，也高于各民族语言，不能简单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看成“汉族的语言”。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族人民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增强中华认同的基本要求，是当代中国公民的义务和必备素质。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一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大量少数民族群众没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极大影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影响了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主流文化的吸收和认同。因而，依据宪法、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持续不断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各民族共享中华文明，这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文化基础，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增强“五个认同”的治本之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破除思想障碍，充分认识各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学习、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要求，是中国公民的必备素质，是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少数民族走向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要充分认识到：“汉语”不仅是汉族的语言，而且是中国各族人民通用的共同语言。要全面认识汉语的性质、地位。现代汉语不仅是汉族的语言，也是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对今天的“汉语”简单地顾名思义、看作是单纯的“汉族的语言”，进而联想到汉族“同化”，这是一种十分偏狭的理解。汉语言发展早，功能完备，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形成的。比如，西汉统一边疆民族地区后，汉语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汉语在历史进程中，也融合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因素，这符合语言发展规律。汉语历史上就成为中国通用语言，是各族人民的自觉选择，不仅各朝代主要交流语言和文献由汉语承担，而且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文学家都以汉文写作并得以流传。许多出身非汉族裔的皇帝、官吏的政论，也都是在后朝修史时

以汉文形式记载下来的；元代农学家鲁明善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诗人萨都刺的诗作、耶律楚材的政论和清代曹雪芹所着《红楼梦》等，都是用汉语创作的重要作品，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现在，汉语文已经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公共语言”。除汉族外，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两个民族（回族、满族）以汉语为母语，4 个民族（赫哲族、土家族、畲族、锡伯族）的绝大多数民众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另一些少数民族（蒙古族、壮族、撒拉族、苗族、瑶族、东乡族、土族、保安族、羌族、仫佬族、白族等）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并使用汉语，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作品用汉文发表。因此，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功能最强大、应用最广泛的语言，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的代表性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也成为联合国 6 种主要工作语言之一。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汉语强大的语言信息功能已经运用到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广泛领域。世界各国有很多人在学习、使用汉语，形成了汉语热。

要充分认识：学习掌握汉语，是中国各族人民学习现代化知识最便利的方式。汉字汉语是记载、表述知识信息的工具，其记载和表述的并不都是“汉文化”。在少数民族教育中，有人把学习用汉文编印、表述的学校教材和课程体系简单看作是学习汉文化，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现在学校统编教材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表述和讲授，但其基本内容是全世界通用的现代知识体系。

现在的汉语言文字（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功能，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含量来看，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现代知识传承体系之一，在中国国内乃至世界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由于应用人口的规模，全国出版物 98% 以上是用汉语出版的，世界上科技、学术的前沿论文也是大量地迅速被翻译成汉语，给通过汉语学习、掌握先进科学文化带来了最大便利。中国各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这些知识，实际是通过汉语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并非学习“汉族知识体系”。政府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对少数民族汉化”，而是促进各民族现代化、推动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现实生活中，各族群众通过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本领，提高素质，走出大山、走出封闭，脱贫致富，促进了发展进步，深受各族人民欢迎。如果把这看作是汉族对少数民族“同化”和“汉化”，进而排斥现代化进程，纯属无知和狭隘。

要充分认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少数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多元共存中如何发展进步，是民族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997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推广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这是贯彻主体性原则。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少数民族语言，国家依法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际工具，而且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情感的纽带，是国家宝贵的文化资源。党和国家根据宪法等法律规定，对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给予了应有支持。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一直在边疆民族地区学校开设，并不断提高质量，教育中既注重中华主流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教学，又重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使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能够学好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现实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电子传媒等领域应用广泛，在民间语言交流中的使用更是普遍，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国家建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机构，负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

学化研究管理。比如新疆，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研发出“博格达维哈柯文排版系统”、“锡伯文、满文文字处理和轻印刷系统”、“边疆民族地区 2000”多文种图文排版系统、“维吾尔文及多文种排版系统”等软件。多年来，各民族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先后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和乌孜别克等民族大量的民歌歌词、神话传说、民间笑话、民间故事、寓言、谚语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推动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别有用心地打着所谓“濒危语言”的幌子煽动民族情绪，是文化分裂主义的惯用伎俩，各民族都要辨清是非。

要充分认识：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教育实现的，在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固守使用单一的民族语言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自身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振兴。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吸收更多科学知识，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素质，繁荣发展文化的最直接途径。边疆民族地区地处丝绸之路腹地，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有学习、使用汉语文传统。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是当时边疆民族地区民汉语言并用、文化繁荣景象的写照。在维吾尔族文化发展史上，凡是多语并用、交流频繁的时期，也是文化勃兴、焕发光彩的时期。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高昌的不少回鹘人会读写汉文。近代考古也发现，高昌回鹘时期大量宗教文书和典籍是用回鹘文、汉文等十多种文字刻印的。在元代，大批畏兀儿人移居内地生活，普遍学习使用汉语，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助推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出现了一个高峰。我国现存的正史——二十五史中的《辽史》《金史》《宋史》三部巨着的编撰工作，就是由一批汉文字修养很高的非汉族史学家共同完成的。他们都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近现代以来，不少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大量吸收内地文化，创作了大量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维吾尔族历史上的名曲《十二木卡姆》通过汉语介绍、整理，更加科学，愈发放出璀璨光芒。新的历史时期，各民族学习、运用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必然能开阔眼界、丰富思维，提高文化素质，在更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充分认识：文化的交融、民族共同性增加是文化和民族发展普遍规律。从世界语言和民族发展规律看，语言总是在多种语言交流中互动发展的，文化也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变迁的。优秀的、适合的保存下来，一些不合时宜的减少了甚至淘汰了；一些语言、文化为多个民族共享，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会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差异的民族语言会越来越少，即在未来社会里，民族归于融合，语言趋于统一。这是文化、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历史的进步，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当然，这毕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们都热爱本民族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有母语情结，并关切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感情是完全正常的，应该予以充分尊重。政府本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予以应有和适当的保护、支持。文化交融、民族间共同性增加，这种自然的融合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符合文化发展和民族发展规律，是历史的进步。各民族文化都是发展变迁和与时俱进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化在竞争中发展，在交融中变化，这是文化发展规律。少数人以所谓纯而又纯的心理看待文化，实际是狭隘封闭、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落后表现，违背历史规律，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论 文】

形似而神异：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民族识别与美国种族识别¹

励 轩²

摘要：这篇论文将会通过对政府文件和其他重要资料的文本分析比较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并检视两种识别的目的、标准选定、实施过程和结果。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与美国的种族识别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民族识别，种族识别，比较视野，中国，美国

2011年胡鞍钢和胡联合发表论文将世界各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模式分为两种：大拼盘模式和大熔炉模式。他们认为苏联、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民族大拼盘模式，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前提，而美国则实行大熔炉模式，保证了它的统一。他们暗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基于苏联民族大拼盘模式的第一代民族政策，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因此有必要过渡到类似美国大熔炉模式的第二代民族政策。^{[1](P.3-4)}虽然胡鞍钢和胡联合对美国种族政治的表述因其精炼主义色彩而受到很多批评，但他们却激发学界去思考我们是否可以比较中国民族政治和美国种族政治，是否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经验以便丰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2]这篇论文将以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为焦点比较两国的民族政治与种族政治。之所以聚焦于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是由于它们是各自民族政策与种族政策的基石。识别结果为民族/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或平权行动提供了工具价值。我在论文中将追溯民族和种族识别的最初目的，然后检视它们的标准及实施，最后对它们的结果进行比较。本文认为虽然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在形式上都属于对人的分类，但其内容却并不一样，无论是最初目的、识别标准还是实施程序都存在极大差异。

一、概念化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

通常来说，中国的民族识别是指当代史上官方推动和实施的人群划分的工程。民族识别在中文中由两个词构成：民族和识别。识别意味着辨别或区分，民族识别应该是指对民族的辨别或区分。但民族是指什么？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却因为中文世界“民族”一词的混乱使用而变得极富挑战性。我们都承认苏维埃话语深刻影响了中文世界中的民族话语构建。如果我们想搞清楚中文世界中“民族”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回到苏维埃的民族话语中去。在苏联的政治话语中，有几个术语与中文中的民族一词高度相关：*народ* (*narod*,³人民) 是社会各个阶段中的人们共同体 (*ethniccommunity*)；*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 部族) 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нация* (*natsiia*, 民族) 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中拥有领土的人们共同体；*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民族) 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⁴。在中文里，最后三个术语都已经被翻译成“民族”，而第一个术语有时也会被翻成“民族”。¹

¹ 本文刊载于《China Tibetology》2016年第1期。

²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³ 文中的俄文拉丁转写采用国会图书馆系统。

⁴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在英文中可以被翻译成 *nationality*。但对该词的定义是有争议的。苏联政府在1934年声称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包括 *нация* (*natsiia*) 但不包括 *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1938年，

根据官方历史话语的解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当时中国除了部分汉人以外的绝大部分族群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苏维埃政治话语中的民族（Нация, natsiia）。因为在 1949 年前，部分汉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苏维埃政治话语中的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也不是最适宜形容汉人的术语。考虑到当时中国有些少数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的现实，民族识别中的“民族”按照苏联政治话语来定义应该是指人民（народ, narod）而非后来惯用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换句话说，苏联政治话语中的人民（народ, narod）一词才最符合民族识别中的民族之义。又因为 народ(narod) 其实等同于希腊语中的 ἔθνος（俄语中的 этнос，英语中的 ethnos），民族识别其实就是对人群或族群的识别。当然，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概念的界定并没有严格遵守学理推断，以致所有被识别出的群体都被冠以民族（俄语中的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英语中的 nationality）的称号。

对术语的厘清并不一定使我们明白术语背后的内容，我们需要挖掘更多关于民族识别的含义。两位参与过民族识别工作的学者费孝通和施联朱曾经解释民族识别的含义。费孝通说民族识别是对人口普查中搜集的 400 多个民族名称进行筛选的工程，从而回答两个问题：中国有哪些民族及有多少民族。^{[4](P.147)}施联朱定义民族识别为辨别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工程。^{[5](P.3)}进一步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认为民族识别是中国在共产主义时期实施的社会工程，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这个工程中决定国家的民族构成。^{[6](P.3)}从他们的解释和定义来看，我们可以获知关于民族识别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民族识别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人群；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识别中对族群进行归类，并对已识别群体确认或给予官方民族名称。因此，本文认为民族识别是新中国区分族群并确认官方民族名称的工程。

像民族识别一样，种族识别的定义也因为“种族”一词的争议性而变得有些复杂。学术界对种族具有生物学正当性还是仅为社会构建一直存在着不同意。本文不想就此再开始一场辩论，取而代之的是支持两位试图综合生物学属性和社会建构属性来给种族下定义的学者。他们认为种族是涉及到不同类型人体特征的社会冲突和利益的象征性概念。^{[7](P.110)}在美国，种族以肤色、地理起源和基因传承的方式被显现出来，每个个体因其生理特征和地理起源被划入特定的群体中。因此，本文认为种族识别是美国政府依据生理特征和地理起源把个体划入为特定群体的工程。如此一来，就可以看出种族识别和民族识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种族识别的对象其实是个体而非已经存在的群体。同时，又因为种族和民族概念的不同，预示着两者在进行识别中所使用的标准也会有很大差别。

二、识别的最初目的

历史档案和一些学术作品显示，民族识别最初是被设计出来用以反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表达的观点：中国的汉人和其他族群应该被称为宗族；这些宗族要么拥有共同的祖先，要么就是在历史上长期通婚；绝大多数宗族都已经融合进单一的中华民族。^{[8](P.12)}在该书出版后，中共的高级干部立刻写文章批驳蒋的观点，认为蒋的说法其实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称：汉人和其他族群不应该被称为宗族；汉人和他们有共同祖先的论调纯属一派胡言；中国不是只有一个民族，而是有很多民族。^[9]虽然陈伯达并没有在文章中仔细区分作为 nation 的民族和作为 nationality 的民族，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观点成为新中国的主流话语。几

苏联政府改变了观点，认为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包括 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 和 нация (natsiia)。具体可参见 Francine Hirsch, "The Soviet Union as a Work-in-Progress: Ethnographers and the Category Nationality in the 1926, 1937, and 1939 Censuses," *Slavic Review*, Vol. 56, No. 2 (Summer, 1997), pp. 267-272.

¹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黑人。

位参与过民族识别工作的著名学者后来都承认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矫正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10] (P. 1); [11] (P. 92); [12] (P. 17)}

然而，这些学者却有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早在 1940 年代就已经开始民族识别工作了。云南省在 1943 年建立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用于调查和识别云南的少数民族，最终这个机构从 150 多个已有族群中划分出了 85 个类型。^[13]更进一步的，早在云南省民族识别之前，1930 年代军阀盛世才受苏联影响在新疆识别出了 14 个民族。^{[14] (P. 378)}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民族识别其实已经为后来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打下了基础。^{[15] (P. 49)}

另外，马戎认为户籍制度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也可能导致了民族识别。根据他的观点，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前提是公民的民族身份信息要登记在户籍上。如果民族身份信息不清楚，少数民族公民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好处。为了搞清公民的民族身份信息，政府必须开展民族识别工作。^{[16] (P. 20)}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事实上是在民族识别开始后的第五年即 1958 年才颁布，这足以说明，民族识别的开始与户籍制度关系不大。

官方开展民族识别应该有其它方面的需要。1949 年，在开展民族识别的四年前，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颁布了新中国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17] (P. 1290)}这条规定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内蒙古之外还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民族区域自治，也证实了将在政府内设置少数民族配额。然而，中共到那时其实还不清楚中国有多少民族，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这种情况显然会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4] (P. 148); [11] (P. 98); [18] (P. 2)}因此，用于澄清中国民族数量和名称的民族识别必须被尽快提上日程。

巧合的是，美国宪法对种族识别的产生也有着决定性影响。根据 1787 年宪法：“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19] (P. 2)}由于奴隶^[3]在条文中并不算作完整的人而是被当做五分之三个人，这个条款也被称为五分之三条款，是北方和南方在联邦内就众议员人数分配问题如何计算奴隶人口而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20] (P. 20-25)}尽管宪法文本中未提及“种族”一词，但“该条款是这个新国家将种族、政策和科学捆绑在一起的第一步。”^{[21] (P. 31)}换句话说，五分之三条款需要美国政府在人口统计中必须按照种族划分人。^{[22] (P. 66); [21] (P. 31-34)}

虽然民族识别和种族识别都跟两国各自的宪法有关，但两国显然有不同的动机。中国政府实施民族识别是为了给少数民族提供自治地位以及政府内的配额。美国此举则是为了通过种族识别捍卫白人特权，有色人种的利益则较少得到考虑。¹

三、识别标准的选择

很少有学者会否认苏联对中国民族识别标准制订的影响。斯大林曾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3]由于上文所提到的翻译问题，在民族识别初期，一些政府官员并没有意识到民族并非是他们想要分类的群体。在辞令上，他们追随了斯大林所给的指示。在云南省，民族

¹ 种族识别的目的在民权运动之后发生变化。对少数民族的保护纳入到种族识别的考量之中。这是为什么种族识别可以维持到现在的原因。

识别调查小组在报告中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必须是民族识别的基础¹。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斯大林定义的过分强调在中国其他地方也非常明显。但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只有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阶段的人们共同体才可称为民族。在现实中，中国所有少数民族都没有进入这两个阶段，因此没有一个符合斯大林民族定义的。

幸运的是，一些参加过民族识别的学者意识到了斯大林定义和中国现实的冲突。^{[4] (P. 154); [10] (P. 3); [12] (P. 12)}作为冲突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民族识别过程使用了民族（nationality）而不是民族（nation）来指称识别出来的族群。因为民族（nationality）可以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人们共同体，这样就摆脱了民族（nation）在发展阶段上的局限。第二个解决方案是提倡在民族工作要做到马列主义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言下之意就是要在民族识别中灵活运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费孝通坚持中国的民族现实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历史长、渊源久；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³。当斯大林定义民族时，他并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需要根据自身实际灵活运用斯大林的定义⁴。这意味着在民族识别中，工作组不仅需要看待识别的族群是否符合斯大林的四个定义，同时也要参考诸如民族名称演变、历史和本民族意愿等其他因素。^{[11] (P. 118-146)}

政府官员在民族识别中显然支持对斯大林定义的修正。198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给各省民委的一份文件中指示：“直到解放前夕，中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他们不可能完全符合斯大林提出的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因此，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四个特征作为唯一标准……”⁵。

在美国，种族识别的标准反映在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Census）和后来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决定的种族分类上。虽然OMB承认这些分类“本质上不应该被解读为是科学的或人类学的”，^[24]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美国人口普查局之前的分类中归纳出一些标准。

自从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肤色一直是区分白人和黑人的显著指标。人口普查中会广泛使用白人和黑人这样的词用于种族分类。例外的情况只发生在人口普查早期和20世纪前中期。在前六次的人口普查中，种族问题一项通常会使用“奴隶”（slave）而不是“黑人”（black）。而在1930年至1960年，黑人（negro）⁶一词取代了黑人（black）。“奴隶”和“黑人”的使用并不是说种族分类中的肤色标准不起作用，因为事实上在美国社会奴隶和黑人通常就是指黑人。

地理起源是另一个重要的识别标准。1870年以来，中国人被确定为一个单独的种族类别。在接下来的人口普查中，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朝鲜人和夏威夷人等被接连确定为单独的类别。到现在，美国的所有人都被划分为五大种族：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亚洲人、土著夏威夷人和其他太平洋岛民。非洲、美国、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太平洋岛都暗示了个人或祖先的地理起源。为什么地理起源会成为种族识别的标准？可能的原因在于地理起源对识别随移民潮而迁入美国的新来者是非常方便的指标。如果我们检视美国人口普查的历史，可以发现地理起源已经逐渐成为比肤色更为重要的标准。甚至自2000年人口普查

¹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内部文件）》，1955：2-3。

² 在中文政治语境中，马列主义通常包括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

³ 费孝通并没有在这里给出民族精确的含义。本文认为在这里民族是指俄文中的 народ。

⁴ 黄光学和施联朱甚至用毛泽东的话来合理化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灵活运用。参见：黄光学，施联朱. 中国的民族识别[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117。

⁵ 国家民委一司：《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几点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识别文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1983：9。

⁶ Negro一词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部分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认为具有冒犯性，认为该词使他们联想到奴隶制、种族隔离与歧视的历史。

后，黑人可以从种族选项中选择“非洲裔美国人”来自称。这显示了美国人口普查局试图避免人们将种族分类跟早期人口普查中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联系起来。

就美国的种族识别而言，其标准也非一成不变。血液纯度（purity of blood）曾是 1860-1920 年间（1900 年除外）种族识别的标准之一。之所以采用这一标准，是为了识别黑白混血儿（Mulatto）¹。现在普遍认为，采用这一标准的动机是为了寻找黑白混血儿由于种族杂交而在生理上产生的弱点，^{[25](P.42)}“从而证明种族隔离对各种族的延续来说是必要的。”^{[25](P.65)}然而，黑白混血儿后代的繁盛最终证明所谓他们生理上的弱点纯粹是无稽之谈。

如果我们比较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的标准，可以看出一些显著差异。民族识别的标准相对来说是稳定的，自从 1954 年开始推进以来都未发生过变化。斯大林的四个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跟其他三个因素“民族名称演变”“民族历史”和“民族意愿”一直是民族识别工作中主要的参考指标。与之相反，美国种族识别的标准则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正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旧有的标准被判定不合时宜或者因其带有种族歧视而遭到抛弃，而像地理起源这样较为中立的标准则被采纳。

四、识别的实施和后果

中国国家统计局 1953 年在大陆开展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所有 18 岁以上的公民都可以自报民族身份。^[26]在那次普查中，政府一共搜集到超过 400 个族名。之后，国家民委派了主要由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构成的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到各省、自治区。这些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与省、自治区及地州民委的干部一道通过观察和访谈申请民族群体成员来分类和合并这些族名。一般来说，研究人员和干部首先会辨识申请民族群体是否是汉族。如果该群体不是汉族，那么他们需要辨识该群体是独立民族还是属于某一其他民族的一部分。^{[4](P.150)}到 1954 年，国家民委总共识别出 28 个民族，而此前，已有 10 个公认的民族存在。到 1964 年，国家民委又从第二次人口普查中搜集的 183 个族名中识别出 15 个民族。（黄光学、施联朱，150，1995）之后，国家民委分别在 1965 年和 1979 年识别出最后两个民族，这样形成了中国的 56 个民族（见表一）。另外，民族识别的结果被广泛运用于户口登记、身份证及人口普查。1979 年后，国家民委还在将一些申请民族群体合并到已识别的民族，但他们终止了新民族的识别，以致有些申请民族群体处于未识别民族的状态²。1987 年，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宣布民族识别基本完成。^{[27](P.16)}习近平主席 2014 年再次重申：“56 个民族就是 56 个民族，不要再细分了，如果再细分，分成几百个民族都有可能。这个口子一开，就会乱了套。”^[28]意味着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会有新的民族出现。

表一、中国的民族分类（1949—2014）

	汉字	拼音	英文
民族识别之前已被广泛承认的民族：10	汉族	Han Zu	Han nationality
	蒙古族	Menggu Zu	Mongol nationality
	回族	Hui Zu	Hui nationality
	藏族	Zang Zu	Tibetan nationality
	维吾尔族	Wei wuer Zu	Uyghur nationality
	苗族	Miao Zu	Miao nationality
	瑶族	Yao Zu	Yao nationality
	彝族	Yi Zu	Yi nationality

¹ 1890 年，甚至“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和“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都被加入到种族分类中。

² 截止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还有 640101 位公民属于未识别民族。此外，1448 位归化公民还没有民族身份。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朝鲜族	Chaoxian Zu	Korean nationality
	满族	Man Zu	Manchu nationality
截止 1954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39	壮族	Zhuang Zu	Zhuang nationality
	布依族	Buyi Zu	Bouyei nationality
	侗族	Dong Zu	Dong nationality
	白族	Bai Zu	Bai nationality
	哈萨克族	Hasake Zu	Kazakh nationality
	哈尼族	Hani Zu	Hani nationality
	傣族	Dai Zu	Dai nationality
	黎族	Li Zu	Li nationality
	傈僳族	Lisu Zu	Lisu nationality
	佤族	Wa Zu	Va nationality
	高山族	Gaoshan Zu	Gaoshan nationality
	东乡族	Dongxiang Zu	Dongxiang nationality
	纳西族	Naxi Zu	Nakhi nationality
	拉祜族	Lahu Zu	Lahu nationality
	水族	Shui Zu	Sui nationality
	景颇族	Jingpo Zu	Jingpo nationality
	柯尔克孜族	Ke'erkezi Zu	Kyrgyz nationality
	土族	Tu Zu	Tu nationality
	塔吉克族	Tajike Zu	Tajik nationality
	乌孜别克族	Wuzibike Zu	Uzbek nationality
	塔塔尔族	Tata'er Zu	Tatar nationality
	鄂温克族	Ewenke Zu	Ewenki nationality
	保安族	Bao'an Zu	Bonan nationality
	羌族	Qiang Zu	Qiang nationality
	撒拉族	Sala Zu	Salarnationality
	俄罗斯族	Eluosi Zu	Russian nationality
	锡伯族	Xibo Zu	Xibe nationality
裕固族	Yugu Zu	Yugur nationality	
鄂伦春族	Elunchun Zu	Oroqen nationality	
截止 1964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54	土家族	Tujia Zu	Tujia nationality
	畲族	She Zu	She nationality
	达斡尔族	Dawo'er Zu	Daur nationality
	仡佬族	Mulao Zu	Mulao nationality
	布朗族	Bulang Zu	Blang nationality
	仡佬族	Gelao Zu	Gelao nationality
	阿昌族	Achang Zu	Achang nationality
	普米族	Pumi Zu	Pumi nationality
	怒族	Nu Zu	Nu nationality
	德昂族	De'ang Zu	De'ang nationality
	京族	Jing Zu	Gin nationality
	独龙族	Dulong Zu	Derung nationality
	赫哲族	Hezhe Zu	Hezhen nationality
	门巴族	Menba Zu	Monba nationality
	毛南族	Maonan Zu	Maonan nationality
截止 1965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55	珞巴族	Luoba Zu	Lhoba nationality
截止 1979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56	基诺族 ¹	Jinuo Zu	Jino nationality
	未识别民族		Unclassified nationalities

¹ 由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文中期间的民族识别中止了。基诺族的增加是文革后民族识别恢复的结果。

	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	Naturalized citizens
--	-----------	----------------------

来源：黄光学和施联朱（1995：147-160）；国家民委

民族识别的实施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循斯大林的标准。如果我们检视识别过程，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如果民族识别出的民族是指 **nationality**，为什么不直接称呼所有脱离原始社会的民族群体为民族？为什么政府会合并一些族群为一个民族？识别者是如何在识别过程中运用斯大林的定义的？它的哪个特征是被强调的？历史因素在什么时候起作用，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起作用？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恰当回答这些问题。结果，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斯大林定义的灵活运用有时候就成了随意的。例如，湖南桃源县生活着数千突厥语穆斯林的后裔。这些人并不说维吾尔语而是汉语，经济生活方式与新疆维吾尔人不同，也不信仰伊斯兰教。如果严格按照斯大林的定义，桃源县突厥语穆斯林后裔与新疆维吾尔人无一处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他们还是被划分为维吾尔人。再比如，新疆的乌孜别克人其实跟维吾尔人共享了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四个特征，可他们却被划分为独立的民族。

在美国，美国人口普查局在 1977 年之前以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方式负责种族识别工作。由于识别标准的变化，种族分类从 179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就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见表二）。在人口普查之前，人口普查局会在国会或其他政治机构的影响下决定种族分类。人口普查员通常会通过观察受访者的外貌特征来填写他们的种族信息¹。1970 年人口普查之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获得了决定种族和族群分类的权力。1977 年，OMB 发布《15 号命令》以便为“在联邦项目管理报告和统计活动中记录、搜集、保存关于种族和族群的数据提供标准分类。”^[24]该机构在《15 号命令》中罗列了四个种族：美洲印第安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和太平洋岛民；黑人；白人。根据这个列表，地理起源和肤色在种族分类的制订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在接下来 20 年采纳了《15 号命令》的种族分类。²但该分类还是遭受了很多批评，“因为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以及人们的新需求。之后，OMB 根据公众评论又修改了种族分类。^[29]从 1997 年开始，OMB 要求联邦机构使用包含五大种族的新分类：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裔；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从 2000 年开始，美国人口普查局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使用了该新分类。

表二、美国人口普查中的种族分类（1790-2010）

1790	1800	1810	1820	1830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其他的自由人；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其他的自由人（不纳税的印第安人除外）；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其他的自由人（不纳税的印第安人除外）；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自由有色人；其他的自由人（不纳税的印第安人除外）；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自由有色人；奴隶。
1840	1850	1860a	1870	1880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自由有色人；奴隶。	b；黑人；黑白混血儿。	b；黑人；黑白混血儿；（印第安人）。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印第安人。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印第安人。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其他。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朝鲜	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

¹ 自我报告也许也发挥作用。

² 1980 年和 1990 年人口普查采用了《15 号命令》的种族分类。

的混血儿；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			人；其他。	朝鲜人；（其他种族）。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朝鲜人；（其他种族）。	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其他种族）。	白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夏威夷人；夏威夷混血儿；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等。	白人；黑人/黑人；印第安人（美洲）；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夏威夷人；韩国人；其他。	白人；黑人/黑人；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韩国人；越南人；印第安人（美洲）；亚洲人；印度人；夏威夷人；关岛人；萨摩亚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其他。
1990	2000c		2010	
白人；黑人/黑人；印第安人（美洲）；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夏威夷人；韩国人；越南人；日本人；亚洲人；印度人；萨摩亚人；关岛人；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	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或黑人；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注册部落的打印名；亚洲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其他亚洲人-打印种族名；夏威夷原住民；关岛人或查莫罗人；萨摩亚人；其他太平洋岛民-打印种族名；其他种族-打印种族名。		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或黑人；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注册部落的打印名；亚洲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其他亚洲人-打印种族名，例如苗人、老挝人、泰国人、巴基斯坦人、柬埔寨人等；夏威夷原住民；关岛人或查莫罗人；萨摩亚人；其他太平洋岛民-打印种族名，例如斐济人、汤加人等；其他种族-打印种族名。	

来源：Nobles (2000:28, 44)；美国人口普查局

a: 虽然印第安人未被列入人口普查计划中，但有如下说明：5. 印第安人——未课税之印第安人将不会被计入。那些已经放弃部落规则和处于州及领地法律下行使公民权的印第安人家庭将会被计入。

b: “白人”并没有出现在人口普查计划中。反而，记录员被告知：“如果是白人的话，就留空白。”

c: 自从 2000 年开始，受访者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种族类别来表示自己的种族身份。

比较而言，民族识别和种族识别实施过程中的区别还是很显而易见的。对民族识别来说，政府官员和研究者在灵活运用斯大林定义的前提下一起合作进行民族划分。这项工作其实是针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并不涉及对个体民族身份的确证。然而对于种族识别来说，每一次人口普查其实都伴随着一次种族的识别，因为种族识别的对象是个人。

民族识别和种族识别都实现了当初推行时想要达到的目的。中国政府可以为已识别民族而非 400 个申请族群建立自治地方。同时，政府也可以按照已识别民族列表在政治机关中为少数民族设置代表配额。同样的，美国政府根据种族识别的结果能够保护白人的政治特权。

然而，也还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产生。两种识别到最后都成为推进其他少数民族/种族公共政策的工具。中国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比如，少数民族公民往往可以享受高考加分。他们也可以比汉族公民拥有更为灵活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民族识别的结果应用到了户口登记和身份证信息上，少数民族公民可以利用他们在这些证件上的民族信息从政府机构或其他社会团体那里获得一些好处。

对美国来说，种族识别曾经被主流社会用来歧视少数种族。但 1960 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保护和提升少数种族权利突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优选项。种族识别也就获得了新意义。告别了作为歧视少数种族的政策工具，种族识别开始用于“推进公民权利，从而把所有美国人都带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流。”^[29]众所周知，平权行动的开展也必须基于种族识别的结果。五分之三条款的制订者恐怕绝不会想到美国主流社会竟然有一天会利用种族识别去保护黑人。

五、结论

中国和美国都在各自推进划分人群的工程。他们为人群划分制订了各种标准，并采纳识别的结果去服务他们其他的公共政策。两种识别都对少数民族/种族产生了不同程度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形式上，这两种识别非常相似。然而，当我们检视这两个工程的动机、标准的选定、实施的过程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形似而神异是一个形容他们之间关系的恰当之词。

参考文献：

- [1]胡鞍钢,胡联合. 第二代民族政策: 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 [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EB/OL].(2014-9-29)[2014—12-7].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83008.htm
- [3]林耀华. 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J]. 历史研究, 1963(2).
- [4]费孝通.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1980(1).
- [5]施联朱.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 [6] Mullaney, Thomas 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7] Omi, Michael, and Howar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8]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M]. 重庆: 正中书局, 1943.
- [9]陈伯达. 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N]. 解放日报, 1943-7-21.
- [10]林耀华. 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 云南社会科学, 1984(2).
- [11]黄光学, 施联朱. 中国的民族识别[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
- [12]施联朱. 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89(5).
- [13]杨履中. 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R]. 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 1946.
- [14]Brophy, David. *Tending to Unite? The Origins of Uyghur Nationalism.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15]尤伟琼. 云南民族识别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 [16]马戎.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J]. 西北民族研究, 2012(3).
- [17]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Z].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18]王希恩. 中共民族识别的依据[J]. 民族研究, 2010(5).
- [19]U. S. Constitution, art. 2, sec. 2. National Archives.
- [20]Fehrenbacher, Don E., and Ward M. McAfee. *The Slaveholding Republic: An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 Relations to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1]Prewitt, Kenneth. *What Is Your Race? The Census and Our Flawed Efforts to Classify America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2]Hochschild, Jennifer L., and Brenna Marea Powell. “Racial Re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1850-1930: Mulattoes, Half-Breeds, Mixed Parentage, Hindoos, and the Mexican Race.”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o. 22, 2008.

- [23] Stalin, J. V.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13/03a.htm#s1> (accessed November 11, 2014).
- [24] OMB, "Directive No.15 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May 12, 1977
<http://wonder.cdc.gov/wonder/help/populations/bridged-race/directive15.html>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4).
- [25] Nobles, Melissa. *Shades of Citizenship: Race and the Census in Modern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6] 人口调查登记表填写说明[J]. 陕西政报, 1953(5).
- [27] 黄光学. 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答本刊记者问[J]. 中国民族, 1987(2).
- [28] 丹珠昂奔. 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前进——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N]. 中国民族报, 2014-11-15.
- [29] OMB,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ederal Data on Race and Ethnicity," August 28, 1995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race-ethnicity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4).

【论 文】

港澳学生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暨南大学的问卷调查¹

梁茂春

内容提要: 根据对暨南大学 4053 个样本的问卷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相对于港澳本地居民, 在中国大陆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度更高, 但却比中国内地学生的明显较低; 不仅如此, 他们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拥护程度、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评价均显著低于内地学生; 在港澳学生中, 港澳本地出生者比非港澳出生者的中国国民认同感也明显较低。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度、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情感反应与他们同中国内地学生、居民之间的跨群际交往机会和交往的亲密度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却与他们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 国民认同、领土主权意识、群际交往

数十年来全球各地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使学术界对少数群体(族群)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²的研究日益升温。那些具有独特文化特性、群体认同或享有高度自治权利的少数群体如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群体、南联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中东

¹ 本研究获得暨南大学统战部的经费资助。在此特别感谢马戎老师及各位同门在研讨会期间对本项研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文责自负。感谢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刘友连、周正庆老师和国际关系学院的陈文老师以及我在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众多同事(限于篇幅, 在此不一一具名)为问卷调查所提供的各种帮助, 感谢我的两位 2011 级硕士研究生张祥云、隋国利同学帮助我发放和回收了大部分问卷、并录入了全部问卷数据。

² national identity 在学术界有多种译法: 民族认同、国族认同、国民认同等等。为了与已经开展大量港澳居民国民认同研究的港澳地区学术界的中文语境相适应, 本文统一采用“国民认同”一词。

一些国家的库尔德人等尤其倍受关注。中国港澳地区的居民虽然不像上述这些少数群体那样在种族、宗教和语言等方面与中国大陆的多数群体存在巨大的差异，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塑造的“非国家化”的地域性认同、“一国两制”的背景下他们与中国大陆居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所享有的权利迥然不同以及与中国大陆依然存在地理、社会上的显著隔离……这种种因素，使他们成为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少数群体。人们不由地产生这样的疑虑：这个群体能否由衷地“回归”中国并与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居民同舟共济、积极参与由中国大陆主导的民族国家建设？

一、相关研究

事实上，近年来的相关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这种疑虑。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前后，境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港澳居民国民认同开展了调查研究，其中多数是关于香港人的身份归属、香港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评价的调查分析。由于十多年来这些调查一直持续开展（Wong, 1996；王家英等，1996 & 1997 & 1999 & 2002 & 2004 & 2007；Lau, Siu, 1997；Fung, 2001 & 2004；萧新煌等，2008；郑宏泰等，2008；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2009；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2010；Lau, et al, 2010；Wang, 2012），因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香港居民国民认同的纵贯数据。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描述性研究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自回归的十多年以来，尽管期间香港居民的国民认同曾随着 2008 北京奥运会等一些重要国际性事件的影响而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出“二元认同”逐渐上升、纯粹中国人认同日益下降的趋势。最近的调查研究表明，自认为属于纯粹的中国人的香港居民未超过三成（Wang, 2012）。

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港澳居民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认同？有的学者认为，对人权自由的认知很可能是影响其国民认同的重要因素。越是支持人权自由的受访者，支持族裔自决的意愿越强烈，国民认同则越弱（Wong, 1996）。另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跨国经验（包括求学、交流活动、经贸合作、观光旅游等）、社会阶层、年龄世代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国歌、国旗的自豪感等中国国民认同状况（Fung, 2001 & 2004；马杰伟，2011）。不过，探讨影响香港居民国民认同因素的经验研究并不多。绝大多数学者在解释这个问题时，仍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香港居民的国民认同之所以难以迅速地转移为中国大陆主导的“大中国认同”，是长期的殖民地历史文化遗产、自由民主思想的盛行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Mathews et al. 2008）。

显然，上述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拓展。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居住在中国内地的港澳居民的国民认同状况，缺乏对与内地居民交往较多的港澳居民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在中国大陆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试图了解（1）与港澳本地居民相比，在中国大陆就读的港澳籍大学生是否对中国人身份有更高的认同？（2）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如出生地、普通话的流利程度、与中国内地学生的交往程度等）的港澳籍大学生是否在国民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3）港澳籍大学生对中国政治环境因素（如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共产党执政等）的评价是否与其对中国国民认同存在相关性？

二、理论与假设

关于港澳人的身份认同，我们需要关注当前两个貌似对立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一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国民认同的经典概括，二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美国国民认同变迁的重要分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83）提出“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们是否认同为一个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成员，与是否共享相同的血缘、文化传统、语言没有必然联系。相距遥远、从未谋面而且血缘、宗教、语言、习俗差异很大的人们也可能对同一个民族（nation）产生强烈认同（如马来西亚的苏门答腊人和安汶人）；而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

通、宗教信仰相同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岸的马来人相互间却看作是不同的民族(nation)。因此,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必需要有基因(血缘)、社会相似性、面对面或亲密的交往才产生共同体认同,关键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体想象”。当然,这种“共同体想象”又主要产生于文字(阅读),即民众受到民间或官方民族主义的有效宣传或动员。

安德森的观点对有关族群认同、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以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等研究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某些经验研究数据无意中为安德森的观点提供了依据:除了非洲裔美国人之外,尽管欧洲裔美国人与亚裔、拉美裔等族裔之间在种族、文化方面差异较大、族际(群际)交往程度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国民认同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Huddy, et al, 2007)¹。

近年出版的一部名著《我们是谁?》与安德森的观点不同的是,它十分强调基因(或血统)、种族文化在国民认同中的意义。作者亨廷顿(2005)认为:美国的盎格鲁·萨克森种族人口、新教文化比重正在日益下降,而拉美裔人口、文化比重则在迅速上升,这将不断削弱美国主体族群所构建的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力,从而有可能最终瓦解盎格鲁血统白人主导的美国国民认同。

亨廷顿的理由是,拉美裔同化于美国主体族群(盎格鲁血统白人)的程度较低,表现为与主体族群相互隔离、文化差异巨大,例如:不会说英语,普遍使用西班牙语,与白人之间存在显著的居住隔离,从而在美国西南地区形成日益庞大的“西班牙语区”,他们对美国的国民认同很低(他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表明,只有不到50%的拉美裔认同为美国人),而对其祖国却表现出较强的国民认同,成为分离美国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力量。

上述两种理论观点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安德森强调“共同体想象”对国民认同的重要性,而亨廷顿则强调同化的意义。前者认为即便两个社会群体被自然地理或社会空间分隔开来,亦即缺乏血缘关系、宗教信仰差异显著、语言迥异甚至生活在不同国度的群体也可能产生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并形成对某一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想象”或认同,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将主要取决于民族主义动员;而后者则认为两个社会群体被自然地理或社会空间分隔开来,则少数族群同化于主体族群的过程就难以完成,从而使少数族群对主体族群所主导的国民认同建构产生负面影响。

上述两种理论观点对本研究的启示是,自港澳回归之后中国大陆主导的国民认同建构似乎一直在有意或无意间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中国大陆官方在港澳地区实施的国民教育(有人称之为“洗脑”),此种教育犹如安德森笔下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试图通过国家有计划的国民认同教育以强化人们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例如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等手段,强化港澳居民对中国大陆主导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这种途径无疑是自上而下的。二是自下而上的途径,这与亨廷顿所谓的“同化”过程相似:随着港澳地区与大陆之间面对面的、广泛的社会交往增多,港澳人的地域性认同逐渐弱化,并自然而然地重新凝聚和强固“中国人”(或“炎黄子孙”、华夏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本研究不打算探讨官方国民教育的效果,而只是试图探讨:在实施“一国两制”、两地居民在政治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被制度化隔离的大背景下,港澳与大陆居民的“有限同化”(只有社会交往、文化等方面的同化,而缺乏公民权利方面的同化)能否使港澳居民形成与中国大陆居民之间的“我们感”(或共同体意识, we feeling),并增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影响“我们感”这种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我群意识的因素不仅有语言、文化和社会交往等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平等共享的状况,对港澳居民而言,历史的因素更不容忽视。事实上,一些学者将回归十数年之后香港居民的国民认同依然较低的事实归因于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与中国大陆的地理社会隔离所导致的国民认同“迷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去国家化”的、特殊的香

¹ 不过这些研究的调查样本量都比较少,仅300个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仍存疑问。

港地域认同。换言之，百年殖民地历史使香港人出现了国民认同上的“结构性失忆”（Gulliver, 1955），即逐渐淡忘或失去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同时却受殖民制度的“非民族主义化”、“非政治化”和非现代公民教育（Tse, 2004a;2004b）的影响而强化了香港本土认同。

目前，港澳地区正处于国民认同重构进程的初始阶段，我们确实不应期望港澳居民迅速产生与中国大陆居民那样强烈的国民认同。但是，我们的猜想是：随着港澳与内地之间互动的增多和了解加深，也许可以促使港澳居民逐渐产生与中国大陆居民的同一体归属感，从而增强对中国的国民认同。以研究的便利性而言，大陆高校的港澳学生群体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试验品”，他们深入内地，接受大陆的教育，与大陆居民一起学习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经验及其“文化亲亲性”（cultural nepotism）将有助于强化华人族群或中国公民之间的凝聚，重塑港澳人作为“中国人”的国民集体记忆。因此，本研究选择港澳学生最多的一所大学——暨南大学作为调查地点，试图探讨解释：与大陆人交往程度的加强是否有助于港澳人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认同。

三、数据与测量

我们通过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广州市暨南大学的港澳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选择暨南大学作为抽样调查地点主要是因为暨南大学一直以来是中国国内招收港澳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港澳学生约占全校本科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研究者长期在暨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则是调研得以顺利开展的便利条件。首先按照分层抽样方法，按照人社科、理工农医的学科分类分别在每个年级中抽取若干班，最终构成了 66 个班的总样本规模，最后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对这 66 个班的学生（其中主要包含港、澳学生）进行全部调查。收回 1228 份有效问卷，其中香港籍学生样本 809 个，澳门籍学生样本 419 个。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展了对暨南大学在地的内地学生的调查，共收回 2825 份有效问卷。这些内地学生的问卷数将在本文中作为与港澳学生比较之用。

我们有必要对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国民认同”进行操作化界定，以便在定量分析中较准确地获得这一主观态度的相关数据。由于国民认同是多维度的，它是由共同的族群、文化、领土、经济和法律政治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的建构（Smith,1991:14），因此在几乎所有的相关经验研究中，尽管对国民认同的测量各不相同，却总是多维度的。一些研究将它操作化定义为人们对其所属国家各方面的热爱与忠诚，通过测量人们对国家主流传统文化、信念等方面的认可、接受、热爱的程度、忠诚感、自豪感，以及人们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等方面的认可、接受、热爱的程度、忠诚感、自豪感的量表来判断人们的国民认同状况（Jones & Smith,2001b）。但是，这些“热爱自己国家和为之自豪的感受”的指标同时也被一些学者用于测量人们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Kosterman & Feshbach,1989），从而混淆了国民认同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界限。何况，貌似包含国民认同的多维度测量指标的一些量表其实是缺乏内部一致性的：一个对某个特定国民共同体有强烈归属感的人很可能对其政治制度或主流传统文化给予较低的评价。同样，将国民认同操作化定义为对国民身份的归属感和对国家政治法制的忠诚感或自豪感（Frank Louis Rusciano, 2003），或将国民认同划分为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赞同性认同”（肖滨，2010）也有相似的问题。因为，将这两种有可能背道而驰的个人主观感受合并在一起考察人们的国民认同，很可能会发现令人尴尬的情况：一个激烈地批判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个人，恰恰正是对这个国家或国民共同体有强烈归属感的人。

其实国民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身份认同。安德森将国民认同看作是一种“我们感”，是人们对“想象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Anderson, 1991），这一界定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亨廷顿则认为，尽管国民认同的各个因素的重要性随各国人民的历史经历而不同，但它归根结底指的是人们的国民身份归属（亨廷顿，2005）。在本文中，我们将国民认同界定为个人主观的、内化了的归属于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国民共同体）的感受（Huddy et al, 2007:65）。这种界定强调

的是个人对特定国民共同体的归属感，它是一种不取决于其政治态度、文化态度的身份归属意识。这样的定义在经验研究中似乎更能避免引起争议，对于分析港澳人的国民认同而言，尤其如此。须知，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国策，不仅意味着港澳居民与中国大陆居民分别居住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并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即便港澳人不接受或批评中国大陆实行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也不一定表示他(她)对中国人的身份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缺乏认同。政治态度只是可能影响港澳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或共同体归属感的因素，但却不应是其构成要素。因此，在操作上，我们主要采用了香港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曾普遍使用的问卷问题来测量港澳生的国民认同，即：你倾向于选择以下身份？(1)中国人；(2)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香港人/澳门人；(3)首先是香港人/澳门人，其次是中国人；(4)香港人/澳门人。这是一个可以反映身份选择倾向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学者对国民认同的测量量表而言¹，这种量表更适合于刚刚回归中国并面临国民身份选择的香港和澳门居民。

四、港澳学生与大陆学生的国家认同差异

1、身份选择：中国人抑或香港人/澳门人？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可以与业已在香港地区学术机构和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进行粗略的比较。我们几乎照搬香港地区的调查问卷问题向在暨南大学就读的在校学生进行提问，即“你更倾向于选择以下哪一种身份？”。表1展现的数据说明，在暨南大学就读的在校香港学生选择“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香港人”的超过了半数，占54.2%，比香港本地居民于2010年的相关比例38.4%高出15.8%；而选择纯粹“香港人”的比例12.2%，则比香港本地居民的17.3%低5.1%。这些数据说明，在暨南大学就读的香港学生相比香港本地居民具有较高的“中国人认同”，同时对香港的“地域性认同”明显较低。不过，我们在暨南大学开展调查的时间要比香港相关机构和学者的调查晚三四年时间，而且香港本地的调查面向所有年龄段的居民，而在暨南大学进行的调查则仅限于几乎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学生，这些因素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者之间的可比性。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相关的问卷调查数据中获得一些有用的新信息，有助于了解在中国大陆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他们与香港本地居民之间的差距。

表1 港澳学生与港澳本地居民的国民身份选择比较 单位：%

	中国人	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香港/澳门人	首先是香港/澳门人,其次是中国人	香港/澳门人	其他、不确定或不回答*
香港本地居民 (2010)**	16.5	21.9	44.1	17.3	0.2(其他)
(2010)***	21.1	27.6	13.8	35.5	1.5(不确定)
暨大香港生源 (n=809)	17.7	36.5	24.5	12.2	9.1
其中：香港出生 (n=348)	13.1	32.3	29.9	18.0	6.7
非香港出生 (n=461)	21.4	40.3	20.8	8.1	9.4
暨大澳门生源 (n=419)	11.6	34.7	28.0	19.5	6.3
其中：澳门出生 (n=290)	9.1	33.8	31.7	20.9	4.5
非澳门出生 (n=129)	17.2	36.7	19.5	16.4	10.2

资料来源：1) 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2)* 在身份选择问题的选项中，2013年暨南大学的调查将“不确定”、“其他身份”和“不回答”合计在一起，因此与2010年在香港进行的两次调查的相关数据差距较大。3)**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调查数据；***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数据。

这两次调查地点在香港，调查对象为香港居民。参见 Chia-Huang Wang, 2012.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Resident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19, No. 2.

¹ 这项研究通过四个问题来测量美国人的国民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你认为成为美国人对你有多重要? 在多大程度上你把自己视作典型的美国人? “美国人”这个词是否能较好地说明你的身份? 在谈及美国人的时候, 你是否经常使用“我们”而不是“他们”? (Huddy et al, 2007:68)

除了向港澳学生提出上述关于身份选择的问题，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以便多维度地定位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观认同状况。表2是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所获得的数据，包含有7个问题，反映的是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认同”的状况。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港澳学生中，港澳本地出生者比非港澳本地出生者具有比较低的“中国人认同”，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更为积极。例如，“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多自豪？”，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的平均分比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高0.2分（1分表示根本不自豪，2分表示不自豪，3分表示无所谓，4分表示自豪，5分表示非常自豪）；而对于第5个问题“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移民到更好的国家”，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比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的平均值也稍低一些。这些无疑表明，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具有更高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感。

统计数据显示，暨南大学内地学生比港澳学生表现出更高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积极的认同，他们对表2的7个问题回答显得更“积极”。例如，在问及“当你看到五星红旗飘扬时，你有多自豪？”和“当你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你内心有多高兴？”这两个问题时，中国内地学生的平均分数达到3.86分和3.81分，远高于港澳学生的相关平均值。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国国家的象征性符号，对它们的情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状况。

表2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的国民认同 单位：平均值

问题	香港生源		澳门生源		内地学生
	香港出生	非香港出生	澳门出生	非澳门出生	
1、成为一个中国人对你有多重要？	3.49	3.77	3.47	3.62	3.91
2、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多自豪？	3.30	3.50	3.30	3.52	3.76
3、当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人的时候，你是否会很关心或很在意他们的批评？	3.83	4.09	3.81	4.06	4.21
4、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会选择做中国人，也不会选择做其他国家的人。	2.88	3.09	2.91	3.08	3.10
5、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移民到更好的国家。	3.54	3.52	3.65	3.59	3.20
6、当你看到五星红旗飘扬时，你有多自豪？	3.22	3.62	3.37	3.56	3.86
7 当你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你内心有多高兴？	3.26	3.56	3.35	3.50	3.81

资料来源：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均采用5等级选项进行测量（分别计以1-5分），经独立样本T检验，表中香港生、港澳生的各项数据与内地学生相应数据均有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或等于0.01）。

2、作为中国人的感受

港澳学生对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们考察港澳学生国民认同的第四个维度。测量这种主观感受的只有一个问题“你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是否感到高兴？”。如表3所示，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内地学生与港澳学生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主观感受存在显著的差异。对港澳回归中国表示高兴的中国大陆学占87.4%，远远超过香港学生的52.6%和澳门学生的48.8%。而“香港出生”比“非香港出生”的香港学生、“澳门出生”与“非澳门出生”的澳门学生也同样差异显著。在香港学生中，17.9%的“香港出生”者表示对香港回归中国“不高兴”和“很不高兴”，比“非香港出生”者的6.7%高出许多；而在澳门学生中，10.0%的“澳门出生”者表示对澳门回归中国“不高兴”和“很不高兴”，比“非澳门出生”者的3.2%高出7.8个百分点。

表3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感受 单位：%

	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感受					对澳门回归中国的感受				
	非常高 兴	高 兴	无 所谓	不 高兴	很不 高兴	非常高 兴	高 兴	无 所谓	不高 兴	很不 高兴
香港生源 (n=807)	14.9	37.7	35.8	7.6	4.1	14.8	34.6	46.4	2.4	1.9
其中：香港出生	9.8	30.7	41.7	10.1	7.8	9.8	27.7	55.6	2.9	4.0
非港出生(n=460)	18.7	42.9	31.4	5.4	1.3	18.5	40.0	39.3	2.0	0.2
澳门生源 (n=416)	10.1	38.7	46.9	2.4	1.9	15.6	42.6	34.0	4.1	3.8
其中：澳门出生	9.0	35.8	49.4	3.5	2.4	15.9	40.1	33.9	5.2	4.8
非澳出生(n=128)	12.5	45.3	41.4	0.0	0.8	14.7	48.1	34.1	1.6	1.6
内地学生(n=2762)	34.3	53.1	11.4	0.6	0.5	34.0	52.8	11.8	0.7	0.4

资料来源：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均采用5等级选项进行测量（分别计以1-5分），经独立样本T检验，表中香港生、港澳生的各项数据与内地学生相应数据均有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或等于0.01）。

3、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

除了上述的“身份选择”、“国民自豪感”等维度外，国家的“领土主权意识”是我们考察港澳学生国民认同的第三个维度。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大陆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将如何反应？”。这是一项多选题，从表4的数据可见，约半数的香港学生选择采取各种形式的行动谴责和抗击外国入侵中国大陆的行为；相比之下，香港学生比澳门学生在抗击侵略中稍为积极一些。在港澳学生中，非港澳本地出生者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又分别比港澳本地出生者来得高。

不过，与中国内地学生相比（问题是：“如果香港或澳门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将如何反应？”），港澳学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识显然要弱许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澳门本地出生的学生，在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我不想参与任何抗击入侵行动”的学生比例分别高达13.1%和13.7%。在此有必要进行补充说明的是，表中的“非香港出生”和“非澳门出生”的学生绝大多数人的出生地是中国大陆，他们中的多数又曾经接受过中国大陆的小学或中学教育（在小学或中学的阶段随亲属移民港澳）。我们可以从表4数据看到，这些主要在中国大陆出生的“非港澳出生”的学生与中国内地学生所表现出的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是比较相近的，这是否可以归因于他们相近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

表4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的领土主权意识比较

问港澳生：如果中国大陆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的反应是？/问大陆生：如果香港或澳门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的反应是？	香港生源		澳门生源		内地学生
	香港出生	非香港出生	澳门出生	非澳门出生	
我将谴责入侵行为	51.2	50.9	47.6	49.5	67.2
我将给抗击入侵的行动捐款捐物	49.5	57.9	37.6	51.4	63.4
只要条件合格，我愿意接受征兵，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参加战斗	18.7	25.9	18.5	18.0	27.8
我愿意随时准备为保卫中国/香港或澳门不受侵犯而献出生命	8.5	11.1	7.5	8.1	10.4
我将采取其他支援中国的行动	8.1	10.1	4.8	8.1	11.0
我不想参与任何抗击入侵的行动	13.1	5.3	13.7	5.4	4.5
样本量	283	397	227	111	2619

资料来源：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的选项均为“是”或“否”，为多选题，受访者可同时多个选项上填答“是”或“否”。

4、对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环境的评价

为了探讨港澳学生的国民认同是否与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评价相关，我们提出了5个问题，请港澳学生分别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民主制度、社会公正、社会法治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等方面进行评价，在1-10分间给分，给分越高说明评价越积极。

表5给我们展现了这些数据，统计结果与前面的许多数据相似。中国大陆学生对这5个方面

的评价都比港澳学生的评价积极一些，其给分均值明显高于港澳学生。而在港澳学生中，非港澳本地出生者对这 5 个方面的评价均值又明显高于港澳本地出生者的评价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生和港澳学生对这 5 个方面的评分均值高低排序则比较一致，表 5 显示，中国大陆学生和港澳学生在“中国大陆尊重人权的程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评价”两项的评分均值都比其他三项的评价均值高，说明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生还是港澳学生都对“中国大陆尊重人权的程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评价比其他三项来得积极一些；而中国大陆学生和港澳学生对“中国大陆社会公正满意程度”的评分均值在他们对这 5 个方面的评分均值中是最低的，说明两地的学生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公正”满意度不高，尤其是香港、澳门本地出生的学生对此项的满意度较低，且其评分均值比较一致，分别只有 3.61 分和 3.63 分。

表 5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对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环境评价的比较 单位：平均值

问 题	香港生源		澳门生源		内地学生
	香港出生	非香港出生	澳门出生	非澳门出生	
我认为中国大陆尊重人权的程度	4.32	4.57	4.18	4.49	5.23
我对中国大陆政治民主的满意程度	3.89	4.23	3.87	4.02	4.76
我对中国大陆社会公正的满意程度	3.61	3.86	3.63	3.84	4.53
我对中国大陆法治的满意程度	3.96	4.08	3.76	4.09	4.70
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评价（满意程度）	4.69	4.99	4.67	5.06	5.58
样本量	348	461	290	129	2825

资料来源：2013 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均采用 10 等级选项进行测量（分别计以 1-10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越满意），经独立样本 T 检验，表中香港生、港澳生的各项数据与内地学生相应数据均有显著差异（P 值均小于或等于 0.01）。

总之，无论是在“中国人身份认同”、“对中国领土主权意识”（包括对港澳回归的情感反应），还是在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评价上，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港澳在校学生总体上比港澳本地居民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倾向，而这种积极倾向又明显弱于内地在校学生；在港澳学生中，港澳本地出生者的国民认同感又明显低于非港澳出生者（实际上多数为中国大陆出生）。我们的这些研究发现与香港学者在早些年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这些学者的结论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出生的香港人比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对中国国家的归属感。而依据我们的经验，那些在三、四岁就移居香港的人比那些到十至十二岁才移居香港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在国民归属感方面与香港本地出生的人无异；而后者比前者更爱国，而且他们与中国内地学生的许多观点基本相似”（Mathews et al, 2007:155）。

四、影响港澳学生身份认同的因素

上述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大陆就读的港澳学生与中国内地学生相比具有明显较低的中国国民认同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发现，那些较多往返于香港内地之间、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普通话、与中国内地居民有较多交往关系的人已经逐渐产生新的“国家想象”（national imagination），尽管他们都没能清楚地表达自己是否有爱国情怀，甚至有些人还严厉地批评中国政府，但“大民族、大国家的空间想象”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日常话语与生活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Mathews et al, 2007:136—137）。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频繁跨境、与中国大陆人接触的香港人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强的中国国民认同，但他们的研究发现和观点却使我们不由地提出这样的疑问：促进港澳居民与内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是否可以提升港澳居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或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以港澳学生的身份认同（即选择作为中国人抑或香港/澳门人的倾向性）、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情感反应作为因变量，分别通过 Logistic 定序分析模型和 OLS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来检验一些预测变量与上述两个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换言之，考察那些与中国内地学生或居民有更广泛接触并结交成朋友、流利地使用普通话等具有更多两地互动关系的港澳学生是否比其他港澳学生有更高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对港澳回归中国有更积极的情感反应。

表 6 影响港澳学生身份认同、对港澳回归态度的因素分析

变量	身份认同的 Logistic 定序回归模型	对港澳回归态度的 OLS 回归模型
	阈值 1=-3.194(.351)	标准化回归系数
	阈值 2=-1.124(.333)	
	阈值 3=.593(.335)	
性别 男=1	-.446(.136) ***	.050*
出生地 香港或澳门=1	.641(.141) ***	-.066**
就读中学 香港或澳门=1	.251(.078) ***	-.145***
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论	-.093(.043) *	.062*
自己所选课程中内地学生的比例	.046(.029)	-.019
自己宿舍中大陆居民或学生的比例	.009(.022)	-.037
自己参与的学生团体中大陆生比例	.026(.026)	.005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担任=1	-.110(.134)	.037
普通话使用的频率	-.021(.030)	.022
对普通话流利程度的自我评分	-.033(.023)	-.004
是否结交有大陆朋友 有=1	-.043(.216)	.051
自己结交大陆朋友的数量	-.081(.081)	-.028
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评价	-.078(.032) *	.127***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	-.077(.039) *	.142***
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	-.110(.033) ***	.215***
	Cox and Snell R ² =.204	Adjusted R ² = 0.237
	Nagelkerke R ² =.219	
	McFadden R ² =.087	
	Model Fit X ² =182.824(p<0.001)	
	平行性检验 X ² =33.785(p>0.10)	
样本量	1228	1228

注：第二列的因变量“身份选择”为定序变量，参见表 1；第三列的因变量为“对香港或澳门回归祖国的态度”，参见表 4。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差。*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6 列出了上述两个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Logistic 定序分析模型（又称为定序结果的比例比数模型）显示：“跨群际交往机会”变量（包括自己所选课程中内地学生的比例、自己宿舍中大陆居民或学生的比例、自己参与的学生团体中大陆生比例、担任学生干部、普通话使用的频率、对普通话流利程度的自我评分等）均不显著；而“跨群际交往结果”变量（包括是否结交有大陆朋友、自己结交大陆朋友的数量¹）同样不显著。这数据结果表明，是否与中国内地学生或居民有充分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例如在自己的课堂上、宿舍里或学生团体中由于内地学生比例较大以及由于自己担任学生干部而与内地学生有较多的接触），以及是否与他们结交朋友、结交朋友的多寡，与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选择并不存在相关关系，换言之，与中国内地学生和居民交朋友或更多地结交朋友，并不会促使港澳学生更认同自己为“中国人”。

相反，在港澳本地出生、在港澳本地就读中学以及“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论”等这些我们称

¹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采用列表的方式询问每位同学：你目前十位最亲密的朋友分别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

之为“成长环境”的变量却对港澳学生对身份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前两个变量非常显著。例如“出生地”为香港或澳门的，其斜率系数达到 0.641，比数比（OR）为 1.898。而“就读中学”所在地为香港或澳门的，其斜率系数达到 0.251，比数比（OR）为 1.285。这些数据表明，当我们把“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是香港/澳门人——首先是香港/澳门人然后是中国人——香港/澳门人”等四个定序的身份选项（参见表 1）放在一起时，在港澳本地出生或就读中学的学生比其他港澳学生更倾向于向右选择，而不是向左选择。换言之，在港澳本地出生、在港澳本地就读中学以及“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价”的港澳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是“香港/澳门人”或“首先是香港/澳门人，然后是中国人”，而选择自己是“中国人”或“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是香港/澳门人”的可能性则相对较低。

同样，可以统称为“政治态度”的变量（包括“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评价”、“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也比较显著，尤其是第三个变量“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非常显著，斜率系数为-0.110，比数比（OR）为 1.116。这一统计结果表明，港澳学生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评价”、“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这三个方面的评价越消极，越倾向于选择自己是“香港/澳门人”或“首先是香港/澳门人、然后是中国人”。可见，港澳学生的政治态度与身份选择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为什么港澳学生对香港、澳门回归的反应相对于中国内地学生较为消极呢？我们通过多元 OLS 回归分析，试图解释“跨群际交往机会”、“跨群际交往结果”、“成长环境”和“政治态度”等变量与这种情感反应（参见表 4）之间的关系。很明显，“政治态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对“港澳国民教育”、“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人权状况”评价的高低与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情感积极性呈正比（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是 0.215、0.14 和 0.127, $p < 0.01$ ）。换言之，港澳学生对这几个方面的评价越低，则越对港澳回归中国感到情绪低落，而评价越高则对港澳回归中国越感到高兴。“成长环境”变量也有较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港澳就读中学的港澳学生比那些在港澳之外就读中学的港澳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更可能感到“不高兴”（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45, $p < 0.01$ ），在港澳出生的学生比其他港澳学生更可能对港澳回归中国表现出消极情绪；自己的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价越消极，则港澳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情感反应就越消极（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62, $p < 0.10$ ）。而“跨群际交往机会”、“跨群际交往结果”的诸多变量均不显著，表明港澳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情绪反应与他们是否与中国内地学生、居民具有社会交往的条件或交往是否亲密不存在相关关系。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港澳本地居民，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港澳在校学生总体上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更高、对中国领土主权意识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评价方面更为积极，但这种积极性又显著低于中国内地在校学生；在港澳学生中，港澳本地出生者的中国国民认同感又明显低于非港澳出生者，而非港澳出生者中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在中小学阶段迁移到港澳的学生，他们在幼年、小学甚至中学阶段在中国度过，由于还有亲人在大陆，他们经常往返于大陆与港澳之间。

我们曾预测，相对于中国内地学生而言，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较低的认同度、较低的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可能与他们对中国大陆主流语言文化了解较少或缺乏与中国大陆社会的互动有关，换言之，与中国内地学生和居民的跨群际交往条件、机会以及跨群际交往的亲密度存在相关关系。然而，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却否定了这种相关性。我们发现，港澳学生的政治态度和早年成长环境是影响其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出生于港澳并在港澳当地就读中学、其长辈对中国大陆有较多负面评论、对港澳国民教育满意度较低、对中国人权

状况和政治制度评价较低的港澳学生会比其他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香港/澳门人”而不是“中国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同样，具备上述相似特征的港澳学生相比其他学生而言，对港澳回归中国的事实表现出低落情绪的可能性更高。

亨廷顿曾提出关于少数民族群的国民认同与其同化程度相关的观点，认为拉美裔之所以有明显较低的美国国民认同感，同时却对其原祖籍国却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认同，缘于他们同化于美国主体族群（盎格鲁血统白人）的程度较低：他们与主体族群相互隔离、语言文化差异巨大，在美国西南地区形成日益庞大的“西班牙语区”，已经成为分离美国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力量（亨廷顿，2005）。上述的研究发现没有支持这一理论，相反却印证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观点，即人们是否认同为一个国民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成员，与是否共享相同的血缘、文化传统、语言没有必然联系。相距遥远、从未谋面而且血缘、宗教、语言、习俗差异很大的人们也可能对同一个国民共同体产生强烈认同（如马来西亚的苏门答腊人和安汶人）；而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通、宗教信仰相同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岸的马来人相互间却看作是不同的国民（安德森，2005：115-116）。换言之，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并不足以阻碍他们之间产生“共同体想象”，人们对国民共同体的认同不必需以基因（血缘）、社会文化相似性、面对面或亲密的交往为基础。

根据此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增进港澳与中国大陆居民之间的跨群际交往并建立亲密的友谊或许并非是提升港澳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今后应更多地关注港澳人的国民认同与其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环境认可度之间的相关性，亦要关注港澳青少年的幼年成长环境以及中小学教育与其国民认同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港澳青少年的幼儿、小学、中学的教育环境与教育内容，增加有关中国正面形象的教育内容，从而增强他们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和中国的国家认同程度。

当然，由于此次调查样本仅局限于就读中国大陆高校暨南大学的港澳学生，因此在我们认识当代港澳人的国民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时，本研究的发现与结论仅供参考，期待更多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2009：“港人对香港政府及公共组织信心及国家认同的意见调查”，<http://www.ln.edu.hk/pgp/level2/pgp-sur-f.htm>。
- 马杰伟、冯应谦、林萃光：《后京奥香港身份认同》，载于吕大乐、吴俊雄、马杰伟合编：《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 王家英：《香港人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一个自由主义的解释》，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6年。
- 王家英：《公民意识与民族认同：后过渡期香港人的经验》，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7年。
- 王家英：《香港人的公民意识与民族认同：回顾一年的发展》，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1999年。
- 王家英、沈国祥：《回归后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识》，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2年。
- 王家英、尹宝珊：“对中国的重新想象：回归后身份认同的延续与变化”，收录于刘兆佳等编《香港社会政治的延续与变迁》，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
- 王家英、尹宝珊：“香港市民身份认同的研究”，《二十一世纪》第101期，2007年。
-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市民的身份认同感”，2010年，<http://hkupop.hku.hk/>。
- 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 萧新煌等：“‘中国印象’的变与不变：台港民众的认知比较，1997—2004”，收录于黄绍伦等编《新世纪台港风貌》，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8年。
- 郑宏泰等：“身份认同：台港澳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2期。
- Frank Louis Rusciano .2003.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 23-Nation Stud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6, No. 3.
- Fung, Anthony, 2001. “What Makes the Local?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Cultural Studies*, Vol.15, No. 3/4.
- Fung, Anthony, 2004.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y: Hybridising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Identities*, Vol.10, No.3.
- Jones, F. L. and Smith, P. 2001b.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Ba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ative Multilevel Analysi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 (2): 103–18.
- Kosterman, Rick, and Seymour Feshbach. 1989. "Toward a Measure of Patriotic and Nationalistic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10 (2):271.
- Lau, Patrick W., Michael H. S., Lam, and Beeto W. C. Leung, 2010,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Beijing Olympics: School Children’s Respons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 Hong Kong.”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o.41.
- Lau, Siu Kai, 1997. *Hongkongese or Chinese: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onie Huddy and Nadia Khatib,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 Mathews et al, 2007,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Anthony.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Wong, Timothy Ka-Ying, 1996.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 Liberal Explanation”. *Issues & Studies*, Vol. 32, No.8.
- Wang, Chia-Huang. 2012.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Resident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 19, No. 2,

【网站专访】

凝心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专访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勇

2019-12-05 19:0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来源：新华社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5/content_5458840.htm

新华社记者王琦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国庆前夕在京召开。中办、国办又专门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勇。

问：《意见》就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系统阐述，请您谈谈《意见》出台的意义。

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出台《意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意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创新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要求。二是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意见》充分吸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新经验新成果，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基本要求、总体目标、工作原则和重点任务，强化了政策保障。三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注入了新的动力。《意见》强调要不断深化各族群众对业已形成的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这将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问：当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有哪些重要的着力点？

答：根据《意见》的要求，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以政治引领民族团结。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需要有魂，这个魂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持之以恒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各族群众头脑，以此**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以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要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以“三交”增进民族团结。要推动**形成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创造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推动各民族逐步由空间的嵌入到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的全方位嵌入。**

以文化浸润民族团结。要引导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以纪律维护民族团结。广大党员干部要做民族团结的表率，要通过强化政治监督，加强对各级党委、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的纪律约束，为维护民族团结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以法治保障民族团结。**全面贯彻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证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问：《意见》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请问如何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答：首先，要不断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等多重复合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和归属**；引导各族群众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一体统摄多元，要把“一”作为主线，强化国家认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强于个体民族意识；多元丰富一体，要把“多”作为要素，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局面。

其次，要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之**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构建课堂教学、社会生活、主题教育多位一体的教育平台，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清楚认识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

再次，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与时俱进调整和完善民族政策，减小同一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异**。积极推动**嵌入式立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体现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积极推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条例的立法工作。

问：请您谈谈如何动员全社会共同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一项基础性事业，要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履行好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的政治责任。贯彻《意见》，要研究制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发展战略和相关规划，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统筹实施。要加强统筹协调，构建创建工作体制机制，明确工作部门和责任，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的政治责任。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同时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强化政策保障，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不断加大培育和选树示范、模范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倾斜。适时增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文明城市测评中的权重。

群众是创建的主力军，基层是创建的主阵地。要坚持抓基层、强基础，把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乡村、学校、企业、连队等基层单位，搭建更多群众便于、乐于参与的平台。要坚持分级联创、分类推进，突出干部、青少年、知识分子、信教群众等群体，加大重点行业、窗口单位和新经济组织等的创建力度。

要不断扩大创建覆盖面，提升参与度。既要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创建，**更要在东中部地区、汉族群众中开展创建**；既要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要重在平时，抓好平常，推动创建工作贯穿到各领域各行业中，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和持久活力。

（文中黑体字由本刊编辑所加）

【书 讯】

《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

马戎

目录

导言

上编 民族话语的历史演进

重构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
中华文化体系的基本特质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
中国文化与政治交往史中的“蛮夷”“入主中原”
西方冲击下中国话语体系的转变
鸦片战争后新观念的进入与中国话语体系的转型
如何认识“跨境民族”
历史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
中国应加强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因素的研究
从犹太人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启示

下编 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
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
汉语学习与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少数民族精英如何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圆梦中华”，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坚持民族平等和良性互动，建设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和谐社区
培养掌握“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语言和研究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人才
关于藏区和新疆加强双语教育和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思考
研究新形势下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96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